

❖品茗谈文

“忧乐”二字总关情

——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琐议

周玉清

读过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的人们，无不为此篇正文不过区区363字的精彩文章所折服。它立意深刻，气势磅礴，声情并茂，字字珠玑。

自《岳阳楼记》公元1046年问世后，就出现了文学“溢出效应”，让许多读书人很是惊诧。其一，岳阳楼因《岳阳楼记》闻名遐迩，滕子京因此而不朽，似乎岳阳楼不是重修而是滕子京创建的。其二，范仲淹把岳阳楼、洞庭湖写入文章，而后，《岳阳楼记》化作了“文化景观”，引来许多骚人墨客竞相留下美文。于是，美文和美景在更广阔的时空交相辉映。其三，范仲淹之前和之后，史上许多文章大家，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欧阳修、黄庭坚、陆游、陶澍、魏源等，都写过有关岳阳楼、洞庭湖的诗词歌赋，不少人比范仲淹更有名气，但都淹没在《岳阳楼记》“忧乐”二字的品味之中。

范仲淹从没到过岳阳，却能写出《岳阳楼记》这样的传世之作，这就使一些人对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产生疑惑，似乎不需要深入生活，也能写出好文章。消除这种疑惑，需要深读范仲淹。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，却有着在洞庭湖边的安乡县生活学习三年的经历。

《宋史》记载，范仲淹的父亲范墉，于宋淳化元年(990)在武宁节度使掌书记的职位上病逝，当时范仲淹不到两岁。其母谢夫人改嫁给缙州长山人朱文翰，朱当时在江南平江府(今江苏吴县)任职。范仲淹从其继父姓，改名为朱说。另据宋代任友龙所撰《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》

记载，宋太宗至道元年(995)，当时安口(今安乡)知县为朱文翰，不满7岁的朱说，随继父在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安口生活、学习，直到三年后朱文翰离任。这三年，洞庭湖的地理环境、浩渺气势早已印刻在范仲淹的脑子里。翻阅《范仲淹全集》，可以印证，在撰写《岳阳楼记》之前，他分别于宋明道二年(1033)、景佑元年(1034)、庆历四年(1044)都写过有关洞庭湖、岳阳楼的律诗，可见他对洞庭湖了然于胸。何况，滕子京派专人送信给贬在河南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，恳请给重修的岳阳楼撰文时，同时送来了《洞庭晚秋图》，为范仲淹提供了“视觉图样”。

《岳阳楼记》写景高人一筹：视野开阔，灵韵生动，气势奔涌，让人感奋。而且，范仲淹不是为写景而写景，而是借景抒情，借楼抒怀。看似写岳阳楼，实则借题发挥，着力表达他的人文情怀、吏治理念和官宦经历。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乐观，应该是《岳阳楼记》的“诗眼”，是范仲淹的思想最闪亮之处。当然，这也是能引发历朝历代读者的共鸣，从而使《岳阳楼记》得以传颂的根本原因。

“忧乐”二字总关情。没有相当的思想深度、才华学识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底蕴，写不出这等水平的《岳阳楼记》。而在这方面，比较他人，范仲淹更具优势。

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考中进士后，范仲淹一直行走在官场，上下沉浮，几起几落。多个岗位，多项官职，他总是

心忧社稷，关注民情。每到一处，总能表现出过人的履职能力，总能获得颇佳的民意口碑。宋康定元年(1040)，西夏反叛，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，他施行军事制度改革，使军力增强。加之屯田戍边策略得当，不到三年，便逼使西夏请和，边疆暂时安定。宋庆历三年(1043)，宋仁宗褒其作为，任他为枢密副使，并升迁为参知政事(相当副宰相)。他不改秉性，刚上任不久，便向宋仁宗提交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，这是他的全面改革(本质上还是改良)奏章，涉及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等十个方面。“庆历新政”方案，妨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，遭到皇亲国戚、公卿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和肆意诋毁，新政无法推行。庆历四年，范仲淹被贬为陕西邠州知州。第二年，范以治病为由，再次上书，自请另调河南邓州知州，得到批准。

宋庆历六年(1046)六月十五日，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的信和《洞庭晚秋图》，并没有立即动笔，而是反复在腹中谋篇，直到胸有成竹。于三个月后的九月十五日，才漫步到自己创办的花州书院挥毫泼墨，《岳阳楼记》一气呵成。

谁能说《岳阳楼记》没有生活基础？（周玉清，隆回人，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）



❖煮酒论史

邵阳最早的基层党组织——三溪桥党小组(下)

晏胜利

三、支援红军

1935年11月底，肖克将军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部路过大同镇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十六师抵达三溪桥，红军部队指战员居住在三溪桥街上。处在革命低潮时期的三溪桥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，地下党组织成员周维渥、颜霖、李日章、刘荫仁、钟毓华、谢序仁等恢复建立中共三溪桥支部，周维渥任支部书记。他们积极开展支援红军活动，组织群众欢迎和慰问红军，配合红军宣传革命真理，组织筹粮筹款和扩军工作。

王震还在三溪桥群众欢迎红军大会上发表演讲，充分展示红军长征是宣言书、是宣传队、是播种机的伟大作用。大同镇先后出现五位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，他们是周述咸、张学社、刘伯生、颜纯和刘声莲(石芝)，其中两位在江西井冈山加入红军，另三位

跟随王震将军长征，但只有女青年刘声莲胜利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。

四、迎接解放

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被消灭，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，三溪桥党组织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，为迎接解放做好工作。1949年夏天，共产党员刘劲、刘泉清召集在同大中学(大同高等小学堂1943年7月更名为同大初级中学)任教的共产党员唐振宗、易扬、周维渥、刘荫仁、谢序仁、李日章、周维汝等，传达上级党的指示，恢复三溪桥党支部。在党组织领导下，他们积极参与新化县解放的革命斗争，宣传发动群众，组织欢迎解放军进区进校，为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做好各项服务；并负责收编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力量，为保障人民和包括学校在内的资产安全出谋划策，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49年10月，新化县第三区宣布解放，南下干部随解放军部队来到区公所所在地三溪桥，区委、区公所机关驻三溪桥文昌宫；南下干部宇自修同志担任中共新化县第三区区委书记，原三溪桥支部(合同大中学党支部)成为区委直属支部。在区委领导下，三溪桥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，不忘初心，挺起腰杆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奋斗，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、肃特剿匪等工作的最坚定组织者和急先锋。受区委指示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、三溪乡农会主席晏忠思，担任同大中学第一任董事长，代表共产党接收同大中学的一切事宜。

当今，三溪桥村、时荣桥村、罗桥村等，正借助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历史机遇，继先烈遗志，续历史光芒，创美好未来。

（晏胜利，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）

❖史海钩沉

砥砺锋锷，不开“后门”

——蔡锷廉政事迹之一

陈湘林

1882年12月，蔡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。1887年，随家人迁居武冈山门黄家桥(今洞口县山门镇)。蔡父起初做裁缝，后来做过几个行业的小贩，也曾教过私塾。蔡母白天砍柴、磨豆腐、煮酒做饭，夜里则干针线活，和丈夫一起艰难地支撑着家庭。蔡家住宅出门就是山道，崎岖陡峭，阴雨黑夜，泞滑难行。蔡锷父母常搓草绳做成脚码子，连同捆成火把的杉树皮，分文不取送给赶路的夜行人。蔡锷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生活清贫仍乐善好施的家风，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、艰苦朴素、舍己为人的精神风骨，铸就了清廉正派、大公无私、造福黎民的家国情怀。

蔡锷原名为蔡艮寅，1900年追随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。失败后，他痛定思痛，改名“锷”，意为“砥砺锋锷，从新做起”，表明一种破釜沉舟、刺破青天的志向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。

1911年，蔡锷响应武昌起义，在云南发动起义，宣布云南独立。11月1日，云南成立新的军政府，年仅29岁的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蔡锷，被公推为首任云南军都督。消息传回蔡锷家乡，亲朋好友异常兴奋。蔡姓和其夫人刘姓两家20余人，不辞辛苦，辗转来到昆明求蔡锷安排工作。刘姓亲友刘肇沅对蔡锷说：“他们远道而来，工作不分大小高低，你总得安插。”蔡锷对刘肇沅说：“五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游山玩水，你在这里游览一两个月是可

以的，我是欢迎的。其余的人我实在不能安插工作，叫他们赶快回湖南去，我帮助他们解决旅费，不要在此久留。”情到话到则不能违，众亲友也通情达理地离开了昆明。

当年，蔡锷的二弟蔡钟也跑到云南，想求个一官半职。以蔡锷的权力，给亲弟弟谋个差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，但蔡锷对这种“走后门”的行为非常抗拒。一天晚饭后，蔡锷找二弟谈心，言明自己身为都督，不能带头开这个口，劝二弟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。蔡钟听后一言不发，闷闷不乐。蔡锷却寸步不让，二人僵持了一阵。蔡钟见大哥不肯松口，毫无回旋余地，无奈之下徒步返回了老家。

1913年9月，蔡锷在奉调进京离滇时，“先是滇人欲为建立生祠”，被蔡锷坚决制止；后云南省议会约定赠送法金3万元，蔡锷又坚辞，议会亦坚持，出于礼节，蔡锷接受5000元以偿还债务及资助湖广会馆等。1916年，湖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鉴于与蔡锷的友情，曾考虑安排蔡钟为湖南省铜元局局长，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美差。然而此时在四川因病重即将去日本就医的蔡锷，专门发电袁家普，称其弟“恐年少，有误公事”。抗战时期，李宗仁路过宝庆，曾去看望蔡锷家人，得知蔡锷两个弟弟家境贫寒，仍在农村干活，没有人当官，不禁对蔡锷肃然起敬。

（陈湘林，任职于邵阳市纪委监委）

❖思想者营地

东 坡 读 书

刘绍雄

“子瞻(苏轼字)好学，弥老不衰。”从七岁始，苏轼在天庆观读，在栖云寺读，在华藏寺诗；从父母读，从张易简读，从刘巨读；职余读，谪居读，老惫读……他在《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》一诗中言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意思是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。他认为：读过的旧书要一遍遍地诵读，只有读熟了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明了其中的意思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是苏轼读书名句，认为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气质。

苏轼与人论“作文之法”时，说到“读”之用：“作文先有意，则经史皆为我用”，因为“天下之事，散在经子史中”。年轻时，他就坚持不死读书，也不读死书，以“读而致胜乃可贵”。

博览群书的苏轼，对《汉书》情有独钟。谪居黄州时，朱载上到访，东坡先生完成“日课”后始出见，甚表抱歉。朱问：“迺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？”东坡说：“抄《汉书》。”朱说：“以先生天才，开卷一览，可终身不忘，何用手抄也？”东坡说：“不然。我读《汉书》，至此已做了三通手抄了。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，次则两字，今则一字。”他让人拿来抄册，任朱随指一字，便诵出相关段落，数百言而一字不差。连指几字皆然。朱喟叹曰：“先生真谪仙才也！”他这种创造性的读书方法，亦非常人可仿效。

元祐八年，58岁的东坡先生为18岁的皇帝宋哲宗赵煦侍讲时，“现身说法”地讲述了自己由

浅入深的读书经历：“臣等幼时，父兄驱率读书，初甚苦之；渐知好学，则自知趣向；既久，则中心乐之；即有乐好之意，则自进不已。”他这种由被动变为主动学习的精神，是读学有成的强有力保障。谪居海南的岁月，东坡是与陶渊明、柳宗元一起度过的。他说：“最喜读陶渊明、柳子厚(柳宗元字)二集，谓之‘南迁二友’。”不但读，而且作，其“于渊明之诗，无首不和”。儋州名士黎子云家有柳宗元的书，东坡先生常造访黎家借阅，“终日玩诵，一日遇雨，借笠屐而归”。

谪居黄州时，东坡先生曾手抄《金刚经》，又曾为庞安常《伤寒论》作序；自海南还，夜宿曹溪，则手不释《景德传灯录》。体验到了“观书之乐”的东坡先生，“夜常以三鼓为率。虽大醉，归亦必披展，至倦而寐”。

其读《周易》《论语》而得“道”：“道家者流，本于黄帝、老子，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，以虚明应物为用，以慈俭不争为行，合于《周易》何思何虑、《论语》仁者静寿之说，如是而已。”他一再遭贬期间，其“覃思《易》《论语》，大有所得，发为文字，洋洋乎”，而有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。其被贬儋州间，读《尚书》而作《书传》。

东坡先生一生好读书，“平生无所嗜好，以图史为园囿，以文章为鼓吹……不见老人衰惫之气”。读书，让东坡先生成为诗文书画皆精的一代大文豪。

（刘绍雄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）